

中国思想学说史

主编 张岂之

明清卷(下)

GUANGDO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思想学说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明清卷(下)

主 编 张岂之

分卷主编 方光华 肖永明 范立舟

目 录

绪 论



第一篇 心学篇

第一章 明代朱学 23

第一节 程朱理学在明初思想统治地位的形成 23

第二节 明代朱学的发展与心性说的萌生 26

第三节 明代经学 39

第二章 明代王学 44

第一节 王学的思想渊源 44

第二节 王阳明其人其事与其书 49

第三节 阳明学的基本特征辨析 52

第四节 陆王异同 60

第三章 王学的发展与分化 64

第一节 明代的反理学思潮 64

第二节 王学的分化及现成良知派 73

第三节 江右诸子及王学的守成派 78

	第四节	王学与明代学术	83
	第五节	王、湛之学与明代讲学书院	88
第四章	泰州学派		98
	第一节	王艮、王襞父子	98
	第二节	王艮的“良知”新说	102
	第三节	王艮之学与宗教思想的相互融合	110
	第四节	王艮之学与早期启蒙思潮的关系	114
第五章	泰州学派后学		118
	第一节	泰州学派的后继者	118
	第二节	后继者对阳明学的修正	125
	第三节	后继者对王艮之学的阐扬	131
	第四节	后继者对文化传统的取舍	139
第六章	东林学派		144
	第一节	东林书院	144
	第二节	东林学者的讲学、结社活动	150
	第三节	东林学者的经世思想	159
	第四节	东林学者的学术造诣	168
第七章	明代宗教		179
	第一节	明代佛教与心学	179
	第二节	明代道教与心学	191
	第三节	明代回教与心学	203
	第四节	明代民间宗教	212



第二篇 启蒙篇

第一章	启蒙思想的兴起	227
	第一节	明清之际的历史变革 227
	第二节	程朱理学的消沉与世风、士风的转变 237

第二章	体用一贯的南北大儒	243
第一节	刘宗周思想论析	243
第二节	清初大儒孙奇逢	250
第三节	李颀的思想与学术	254
第三章	黄宗羲的工夫本体论	259
第一节	“盈天地皆心”的哲学精神	260
第二节	《明夷待访录》的启蒙思想	270
第三节	《明儒学案》与《宋元学案》	281
第四章	王夫之的思辨之学与学术贡献	288
第一节	王夫之的思想渊源与学术精神	289
第二节	生化的自然唯物论	300
第三节	道器、知行与人性	308
第四节	《读通鉴论》与王夫之的历史观	315
第五章	顾炎武的经学与史学	323
第一节	顾炎武对理学的批评	324
第二节	顾炎武的学术精神与治学方法	330
第三节	“明道救世”的经史之学	342
第六章	颜李学派的习行经济之学	352
第一节	颜元对宋明理学的全面批判	352
第二节	颜元的实事、实物、实动、实行之学	363
第三节	李塨、王源之学	370
第七章	朱之瑜与傅山的异端风骨	379
第一节	一南一北的爱国者	379
第二节	朱之瑜的学术特色	384
第三节	傅山诸子学研究的学术意义	391
第八章	明清之际的特立独行之士	398
第一节	陈确对理学的批评	398
第二节	唐甄思想探研	401
第九章	明末清初的质测通几之学	405
第一节	方以智思想的哲学与科学精神	405

- 第二节 徐光启、李之藻会通中西的学术主张及学术贡献 418
- 第三节 王征——信仰天主教与传播西方科技的一个个案 429



第三篇 考据篇

第一章 阎若璩的学术成就及其思想史意义 442

- 第一节 阎若璩的学术成就：以《尚书古文疏证》为中心 444

- 第二节 阎若璩学术成就的思想史意义 453

第二章 江永易学与音韵学 457

- 第一节 江永生平与著述 457

- 第二节 《河洛精蕴》与江永的义理之学 459

- 第三节 江永的音韵学 467

- 第四节 江永考据学理念在其他领域的运用 480

第三章 惠栋的考据学与义理学研究 482

- 第一节 惠栋的家世 482

- 第二节 惠栋的易汉学 488

- 第三节 惠栋的其他学术 497

- 第四节 惠栋的学术影响 503

第四章 戴震的考据学与义理学研究 507

- 第一节 戴震的早期著述与义理倾向 507

- 第二节 戴震中晚期的义理思想 517

- 第三节 戴震的生命观与考据学体系 532

- 第四节 戴震的义理之学与清代政治的关联 541

第五章 焦循的经学与天算学 550

- 第一节 焦循的生平与思想倾向 550

- 第二节 《加减乘除释》的思想史意义 555

第三节 焦循易学:《几何原本》世界构图的吸收与超越 561

第六章 阮元的学术思想 581

第一节 阮元的学术宗旨与方法 581

第二节 阮元的汉宋学术史观 589

第七章 乾嘉三大考史学家 593

第一节 王鸣盛的学术造诣 593

第二节 钱大昕的学术造诣 598

第三节 赵翼的考史功夫与学术造诣:立足于《廿二史札记》的考察 604

第八章 章学诚对考据学的反思 608

第一节 章学诚的生平著述与学术倾向 608

第二节 章学诚的史学义例之学 619

第三节 章学诚的文史校雠之学 636

第四节 章学诚学术的内在矛盾 660



第四篇 新学篇

第一章 学术界透入的新气息 672

第一节 由盛转衰的清王朝 672

第二节 经世致用学派的崛起 675

第三节 汉学与宋学会通 680

第四节 学者对西学的初步感知 687

第五节 清代今文公羊学的兴起与衍变 691

第二章 “中体西用”学派的学术评估 695

第一节 冯桂芬的学术新思路 695

第二节 郭嵩焘对中西之学的感悟 705

第三节 张之洞对“中体西用”的理论化 717

第三章	严复对西学的介绍及其学术价值	731
第一节	对进化论的选择和创新	731
第二节	对自由学说的深层理解	741
第三节	逻辑学领域的突出贡献	750
第四章	康有为融通中西的努力及其大同理想	756
第一节	今文经学的研究成果	756
第二节	对西学的思考和研究	764
第三节	“大同”社会的理想	768
第四节	中西新旧之学的思考	774
第五章	梁启超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贡献	779
第一节	西学研究的视角	779
第二节	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792
第三节	启蒙民众的“新民说”	800
第六章	章太炎的思想与学术	810
第一节	哲学思想的理论框架	810
第二节	传统学术研究的成就	822
第三节	深厚的佛学造诣	834
第七章	孙中山对中西思想的研究和选择	845
第一节	孙中山对儒学的研究与改造	845
第二节	三民主义的思想学术价值	853
第三节	融会中西的哲学思想	875
第四节	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	885
第八章	一代学人王国维的学术建树	895
第一节	对西方哲学的介绍和研究	895
第二节	史学思想和方法的创新	902
第三节	传统学术的研究及其成就	910
第四节	王国维的学术地位	925



第五篇 天算篇

第一章 明代的数学 938

- 第一节 吴敬与王文素的数学成就 938
- 第二节 明代中后期其他几位数学家及其著作 942
- 第三节 程大位与珠算的发展和普及 945
- 第四节 西方数学的传入 948
- 第五节 明末学者对西方数学的初步研究 951

第二章 明代的天文学 953

- 第一节 明代的天文政策 953
- 第二节 朱载堉和邢云路的天文历法工作 958
- 第三节 明末耶稣会士传入的西方天文学知识 962
- 第四节 明末的历法改革与《崇祯历书》的编撰 965

第三章 清代的数学 972

- 第一节 王锡阐、梅文鼎的数学成就 972
- 第二节 通贯集成:《数理精蕴》的编撰 980
- 第三节 返古归今:对传统数学的梳理 984
- 第四节 蓄势待发:中国传统数学向新领域的过渡 998
- 第五节 中算重建:中国近代数学的肇始 1006
- 第六节 清末期的数学研究与翻译工作 1018

第四章 清代的天文历法 1023

- 第一节 《历学会通》与《天步真原》 1023
- 第二节 王锡阐的天文历法工作 1028
- 第三节 梅文鼎的天文历法工作 1031
- 第四节 《历象考成》和《历象考成后编》 1034

第六节 鸦片战争后西方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

主要参考文献 1042

第二节 戴震中晚期的义理思想

戴震中晚期的哲学,主要以四部书及若干篇文章作为代表。四部书有《原善》三篇(1758年至1662年)、《原善》三卷(约完成于丙戌,1766年)^①、《绪言》(有可能成书于1772年)^②、《孟子字义疏证》(应在1776年有定本)^③。此外,还有若干篇文章:《读易系辞论性》、《读孟子论性》、《与某书》、《与段若膺论理书》、《与段若膺书》、《答彭进士允初书》。

关于戴震的哲学著作,杨向奎有一段评论:“戴东原治学方法谨严,思想发展的线索清晰。对于学术思想问题,他总是反复思考,而不断补充或者加以修改。胡朴安的《戴先生所著书考》说:‘……《原善》有前后二种,《孟子字义疏证》也有前后两种,《安徽丛书》第六期《戴东原先生全集》中的《绪言》一书,即《孟子字义疏证》的原稿。段玉裁的《戴东原先生年谱》曾经指出这一点说:‘《孟子字义疏证》原稿名《绪言》。’虽然原稿本与定稿之间只有补充,没有根本分歧,但思想发展的线索还是可以从不同稿本中看出。尤其是《原善》和《孟子字义疏证》二者间也有不同处,虽然一般以为这是同一思想体系的著作。”^④

从《绪言》到《孟子字义疏证》,可以看成是稿本与定本的关系,但《绪言》与《孟子字义疏证》本身又各自有修订的过程。1942年,四川省立图书馆出版的《图书集刊》创刊号,根据张海鹏(嘉庆时期藏书家)照旷阁抄本刊布出《孟子私淑录》。它是《绪言》的初稿,体例上相近,字数比《绪言》少,论述上也不如《绪言》细密。因此,从写作上看,呈现出《孟子私淑录》→《绪言》→《孟子字义疏证》的系列。

戴震中晚期的义理与早期的有显著不同,这种不同分两个层次。其一,

517

① 周兆茂:《戴震哲学新探》,196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

② 周兆茂:《戴震哲学新探》,202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

③ 周兆茂:《戴震哲学新探》,213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

④ 杨向奎编:《清儒学案新编》,第五册,《东原学案》,108页,济南:齐鲁书社,1994。

从学术契机上看,造成早期与中晚期不同的重要契机,是戴震与惠栋的会面。与惠栋的会面,使得戴震感慨良多,并产生了破除义理与考据二分法,使得考据彻底地化为义理的哲学立场。其二,如果细分戴震的义理立场,可以说,在中期,戴震只是叙述自己的观点,虽与宋儒不同,但不明斥宋儒。但到了晚期,戴震明确揭示理欲之辨,直接向宋儒发起挑战。

在与惠栋会面后若干年,戴震回顾道:“然病夫六经微言,后人以歧趋而失之也。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训故,一主于理义。’此诚震之大不解也者。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也,然后求之训故。训故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训故,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彼歧训故、理义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理义,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其亦远乎先生之教矣。”^①

这段话写于1765年,时隔拜会惠栋(1557年)8年之后。上文提到,这段话阐述了戴震要将考据与义理合一的思想,但戴震承认它受到惠栋的影响。

关于惠栋对戴震的可能影响,钱穆有一段很重要的论述:“惟东原游扬州,见惠定宇(栋),而论学宗旨稍变。其为《原善》,或颇受惠定宇《易微言》影响,则差近实耳。”^②戴震回顾道:“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训故,一主于理义。’此诚震之大不解也者。”但在《与方希原书》(1755年)中,戴震明确说:“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③此外,戴震将学问划为三途:义理、考据、辞章。戴震曾明确主张,要将义理与考据划分为二。与惠栋会面后,戴震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这意味着,戴震要将自己在考据学中积累起来的处理义理的经验转用到社会政治领域。戴震是一位义理气质很强的学者,即使是在古音学这种实证性很强的领域中,

① 《戴震集》,《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214页。

②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39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③ 《戴震集》,《与方希原书》,18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戴震也常常是更看重义理的完美,有时到了不惜与普通常识对抗的地步。戴震最早进入六书学领域,即将六书分为“四体二用”,后来戴震进入语义领域,即大力阐发音义合一的原理,由古音的系统建立意义的系统。这时戴震又提出了“由训诂以明我心之所同然者”的义理纲领:“训故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因之而明。”并建立了“训诂—古经—义理—心之所同然”的内在逻辑。

在中晚期,戴震原本想要揭示考据学背后潜伏的义理,至于与宋儒立异,引发争议,并不是戴震的主要目的。此外,与宋儒立异并不等于与宋儒争正统。不少学者说戴震建设其义理,是想与程朱争夺正统,有点夸大了戴震对道统的看法。考据学本质上是一种批评学,它本身否认任何理论可以担任正统,它的基本前提之一,正如戴震在《与方希原书》(1755年)中所说,它的目标是“尽其物情”,而以往的汉儒、宋儒理论都“阙物情”。^①不过,戴震有时也相信,清儒是有可能避免汉宋之短、兼汉宋之长,从而实现完美的学术境界,达到绝对的完善之境的。但戴震对完善的追求是与分理结合在一起的,它们与道统没有直接的关联。相信完善境界的存在,是戴震体系中存在的问题。继承戴震义理思路的焦循,则认为任何理论都不是完美的,每种理论都是既具有普遍的合理性,但又只有相对于具体时空的有效性。

戴震中晚期的义理学分为中期与晚期。大致说,中期以《原善》三篇与《原善》三卷本为代表,尚未明白与宋儒立异。晚期阶段,以《绪言》与《孟子字义疏证》为代表,明确要与宋儒立异。相比之下,晚期作品观点明确,术语自成一系统,比较好读。最难解读的是中期的著作,它们是戴震走出宋明理学的探索记录,在这些著作中,旧的宋明理学与新的考据义理纠缠在一起,新旧两套术语甚至两种思想体系都同时在发表意见,让人莫知其真相。下面,我们主要是分析戴震晚期的思想,并对其中期与晚期思想进行必要的比较研究。

^① 《戴震集》,《与方希原书》,189~19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一）分理、条理

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以“理”开篇，但在中期的《原善》（三篇与三卷）中，是以“善”开篇的。这反映了戴震中晚期哲学的两种叙述方法，其中，晚期的叙述方式更能凸显戴震的内在逻辑。按照中期的体系，以“善”为中心，是以社会价值观念为中心的。而按照晚期的体系，是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开篇是“理”，终篇是“权”，均与认识论相关。但要认识始于“理”、终于“权”的体系，也需要联系中期的《原善》，才能看清楚戴震的思路。

戴震的体系，是从宋明理学中分出来的，《原善》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蒙培元对理学体系有过一个简洁的说明：“理学作为一种哲学形态，有一个完整的范畴系统……这个系统就其基本特性而言……必须从宇宙论开始。以‘理气’为中心的一组范畴，就是讲理学宇宙论和本体论的。”^①理学是以“理气”范畴为中心的，而戴震是以破“旧的理气关系”为起点的。

在《原善》三篇中，戴震一开始便道：“善：曰仁，曰礼，曰义，斯三者，天下之大本也。显之为天明谓之命，实之为化之顺谓之道，循之而分治有常谓之理。命，言乎天地之中昭明以信也。道，言乎化之不已也。理，言乎其详至也。善，言乎无淆杂也。”

戴震《原善》（三篇本）以“善”开篇，与宋明理学以宇宙论和本体论为特色的体系有意识地拉开了距离。所谓“善”，即“仁礼义”（暂不含智），即为人世间的价值观。宋明理学最终的主题仍是人伦，但是，理学家认识到，在宋代以后，这些人间价值观并不是直观自明、毫无疑问的，因此要对它们作更多的论证。无论是《近思录》、《性理大全》、《性理精义》等理学选集或合集，还是著名理学家的个人著作，大量的篇幅都是在讲理、气、无极、太极等宇宙论范畴。但这套宇宙论图像，自明末以来受到西学以及传统中的对立流派质疑。宇宙论图像离不开可靠知识的支持，但清初之后，在江南知识圈的努力下，再加上康熙皇帝的支持，加速完成了知识的转型。在此基础上，黄宗羲、毛奇龄、胡渭等人（尤其是胡渭的《易图明辨》）则从易学理论上瓦解了旧的太极无极的宇宙图像。江永为了捍卫理学家的基本立场，大量引入新兴

① 蒙培元：《理学范畴系统》，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的天算学与音韵学等,构造了新型的图书学。在江永的学术中,旧的宇宙论与新的知识论之间存在高度的紧张。进入北京之后,戴震在宣传江永的学说时屡屡受挫,最后导致戴震改变了对于江永的看法。戴震与宋儒的决裂,从学术上看,是从他与江永的分离开始的。这种分离的典型标志,即是在谈善(仁义礼)之先,不再谈很多的宇宙论与本体论,而是直接切入“善”的领域。在整个《原善》的“上篇”(或上卷)中,戴震一直被夹在新旧之间,一点一点地从旧地盘上向新领域突围。

在《原善》(三卷本,是三篇本的修订版)中,上述表达已经有所改变。“善:曰仁,曰礼,曰义,斯三者,天下之大衡也。上之见乎天道是谓顺,实之昭为明德是谓信,循而而得其分理是谓常。道,言乎化之不已也。德,言乎不可渝也。理,言乎其详至也。善,言乎知常、体信、达顺也。”

上述叙述结构在《原善》三篇本与《原善》三卷本中完全一致,但范畴有所改变。兹列表如下。

《原善》三篇本	《原善》三卷本
天下之大本	天下之大衡
命,道,理	顺,信,常
命——信	道——化之不已
道——化之不已	德——不可渝
理——详致	理——详致
善——无淆杂	善——知常、体信、达顺

下面逐条讨论两者的区别。

1. “大本”与“大衡”。

有学者指出,“‘善’为‘天下之大本’改为‘天下之大衡’,即,将‘善’从包罗万有的精神实体变为衡量社会伦理道德的是非标准。这种对‘善’的诠释,虽然仍未摆脱唯心主义性善论的窠臼,但与其早先的唯心主义观点相

比,已有了明显的区别”^①。注意到这里的转变,是很有启发的观点。这里的转变,并不涉及唯心唯物之争,但却涉及理学宇宙论本体论与考据学实学操作论的区别。

戴震原先是在理学的意义上使用“大本”一词的。这个“本”与“本末”的“本”是有关的。在“本末”的宇宙图像中,戴震将“善”看成是仁、义、礼诸范畴的体系,但这个体系是一个有“本”有“末”的生命体。将“善”说成是“大本”,这意味着宇宙的本体是一道德的生命根源。

在三篇本中,戴震将“善”的目的定义为“无淆杂”,具体内涵尚不明晰;而在三卷本中,戴震将“善”的目的定义为“知常、体信、达顺”,为善给出了更具操作性、更为具体的目标。这一转变,最终表现在《孟子字义疏证》上。《孟子字义疏证》的首篇是“理”(分理条理),最终一篇是“权”(兼有权衡、权变)。

2. “命、道、理”与“顺、信、常”。

在这里,戴震努力摆脱宋明理学的范畴,换成考据学上有意义的范畴。对考据学来说,义理最终要指导实践,因而,“命、道、理”之类的范畴因为过于抽象而被摒弃,换成了“顺、信、常”。试比较三篇本的文字:“显之为天明谓之命,实之为化之顺谓之道,循之而分治有常谓之理。命,言乎天地之中昭明以信也。”其内容的关键词是“显之、实之、循之”。而三卷本为:“上之见乎天道是谓顺,实之昭为明德是谓信,循之而得其分理是谓常。”基本关键词为“上之、实之、循之”,与三篇本大体上一致,但戴震在此过程中,完成了从宋明理学范畴向实学范畴的转化。

宋明理学家认为,理学(哲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有自己独特的词汇系统。考据学有一个趋势,即它不承认独立的义理之学,认为义理之学寓于考据之中。戴震虽对此有所自觉,但并不彻底。因此,戴震还在努力地发掘理学独有词汇,“顺、信、常”就是其中的关键词。随着思考的深入,戴震也发现这些词带来的困难。后来,在《孟子字义疏证》之中,戴震只选取了少量的范畴。因此,与宋明理学家相比,戴震的范畴体系显得很单薄。对学术史来

^① 周兆茂:《戴震哲学新探》,199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

说,义理之学是否应当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戴震游离于两种立场之间,采取了折中的立场。这种折中立场为戴震在中国哲学史上获得了地位。在戴震之后,焦循才完成了取消义理之学的独立性,将义理之学与经学统一起来的工作。阮元的义理之学是与焦循一同往下做的。因此,阮元几乎没有提出任何独到的哲学范畴,有学者据此否认阮元是一位哲学家。

3. “知常、体信、达顺”。

戴震讲善,为的是研究“仁义礼”。戴震在《原善》三卷本中将善的目的界定为“知常、体信、达顺”。这三条分别对应“礼、义、仁”。

所谓“顺”,《原善》三篇本:“言乎顺之谓道。”《原善》三卷本:“上之见乎天道是谓顺。”“实之为化之顺谓之道。”“顺”与道(天道)有关。“道,言乎化之不已也。”《孟子字义疏证》:“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原善》(三篇本及三卷本):“是故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者,仁乎。”因此,“顺”与“道”有关,它对应于“仁”。

所谓“常”,即为“循之得其分理”。《原善》(三篇本及三卷本):“生生而条理者,化之流。”“生生而条理者,礼与义乎!何谓礼?条理之秩然有序,其著也。”

所谓“信”,对应于“义”。《原善》三篇本:“名其不渝谓之信。”《原善》三卷本:“实之昭为明德是谓信。”何谓“德”?“德,言乎不可渝也。”此处的“不可渝”,与下文的“截然不可乱”是一致的。“何谓义?条理之截然不可乱,其著也。”

在早期阶段的作品《法象论》中,戴震说过:“分也者,道之条理也;合也者,道之统会也。”^①在这里,善是统会,而“仁、义、礼”与“顺、常、信”均为条理。

“分理”背后的现实内容是“礼”。在戴震的体系中,礼与智相关。“礼者,天地之条理也,言乎条理之极,非知天不足以尽之。”^②所谓“知天”,在宋

① 《戴震全集》,第一册,《法象论》,1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

② 《戴震全集》,第一册,《孟子字义疏证·卷下·仁义礼智》,201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